



历史与文学形象之间： 汉、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Han and Song Scholars' Reception Theory of Qu Yuan: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Image**

甄蔚宁

CHIN WEI NING

拉曼大学中文系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RCH 2018**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历史与文学形象之间： 汉、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Han and Song Scholars' Reception Theory of Qu Yuan: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Image**

科目编号: ULSZ 3094

学生姓名: 甄蔚宁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林志敏 师

呈交日期: 2018 年 3 月 30 日

本论文习作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价值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2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难题	4
第四节 章节结构	5
第二章 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之建构	7
第一节 《屈原列传》的屈原历史形象建构	7
第二节 《楚辞》的屈原文学形象建构	10
第三章 汉人对屈原“忠君”形象的衍生	14
第一节 汉人对屈原“忠君”形象的矛盾态度	14
第二节 汉代尊屈派与批屈派的“忠君观”	18
第四章 宋人对屈原“爱国”形象的重塑	22
第一节 屈原作为宋代文学中的“爱国”意象	23
第二节 宋儒对屈原“爱国之诚”的诠释	25
第五章 结 论	29
参考文献	32

历史与文学形象之间： 汉、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习作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习作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姓名：甄蔚宁

学号：14ALB03520

日期：2018 年 3 月 30 日

摘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战国末期的楚国诗人屈原，主要分析后世文人对其历史与文学形象的接受与诠释。本文旨在梳理屈原由文学至历史形象形成的动因、过程和结果，以呈现屈原历史形象的变迁。

通过分析屈原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历史形象和《楚辞》中的文学形象，本文得出前者之皆出自于后者这一结论，即文学形象是历史形象之素材。司马迁是首位为屈原作传并建立其历史形象之人，在接受美学的观点中，他是对后世屈原历史形象接受与诠释具有影响力的“第一读者”。司马迁以屈原的文学形象为其历史形象之素材，致使历史与文学界限模糊，更导致后世衍生或再造出屈原的其他历史形象。在新历史主义看来，这种文学影响历史的情况总是不可避免，屈原之历史与文学形象之间的灰色地带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接着，本文认为，屈原为人所接受的“爱国诗人”形象，便是在汉至宋这段时期逐步完成并深入人心的。本文以社会——历史批评法分别分析汉人与宋人对屈原形象的接受与诠释，探讨文人身处的环境与屈原形象的衍生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汉人面对的是主流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变化，宋人则面对内部党派之争和外部蛮夷入侵。这些历史因素使他们将自身的期待置于屈原身上，做出各种解读，有褒（尊屈派）有贬（批屈派）。总而言之，屈原形象的诠释并非始终如一。“批屈派”在汉代已然存在，在 20 世纪中日之间甚至曾还盛行“屈原否定论”；与他们相对立的便是“尊屈派”。无论古今，无论褒贬，他们的论证无不引自《楚辞》，这可说屈原这位“历史人物”是《楚辞》文本的再创造。由此可见，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灰色地带是古今学者对屈原历史形象进行衍生与重塑的缘由。因此，本文认为，若将屈

原视作历史人物，毫无疑问这位历史人物其实是前代学者以文学形象建构出来的“箭垛式人物”。

关键词：屈原、汉代、宋代、人物形象、历史形象

致谢

谢谢母亲的放纵，我选择了我要走的路。

谢谢老师的提点，我求知的路不算平坦，却也不必披荆斩棘。

谢谢弟弟和妹妹的打闹，使我一路欢声笑语。

谢谢朋友的陪伴，使我一路不孤单。

第一章 绪论

《楚辞》在中国历史中不曾被官方承认过，但是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领域中却有一定的影响力。屈原被认为是《楚辞》中大部分作品的作者，因此《楚辞》的成就便是屈原的成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使屈原的形象更添了几分生动。汉人对屈原的诠释是褒贬参半的，直到宋代洪兴祖与朱熹的努力下，尊屈派¹才逐渐处于主导地位。二十世纪疑古派兴起，该派学者对中国历史提出了种种质疑，屈原亦不能幸免，廖平的《楚辞新解》《楚辞讲义》以及胡适的《读楚辞》都是质疑屈原存在与否的大著。后来，这一说法便成了“屈原否定论”，相关讨论在中日楚辞学界风靡一时。如今，“屈原否定论”已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且就目前各种文学史课本看来，一般人明显更接受历史上真有“屈原”的存在。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价值

历史上不乏批屈派的著作，支持屈原否定论者也大有人在，可是屈原的形象却在许多人心中屹立不倒，个中缘由实在引人好奇。是故，本文便回溯早期文人对屈原的接受与诠释，意欲寻找屈原深入人心的原因。本文主要围绕古代文人做讨论，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够探讨汉人与宋人对屈原形象的接受。

再者，尊屈派、批屈派和屈原否定论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因为屈原其人的不稳定性。根据目前史料记载，与屈原相关的史料便是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文中简称《屈传》）。《史记》为正史，《屈传》中描述的屈原形象便是其“历史形象”，但是《屈传》内容素材多出自《楚辞》。《楚辞》属于文学

¹ 王水照于罗敏中的《屈原与宋代爱国文学》序文中将汉人分成了“尊屈派”（代表为刘安、司马和王逸）和“批屈派”（代表为扬雄和班固），为后世屈原接受之论战的两大派别（王水照，2003：60）。

作品，即使作者以第一人称书写，亦不排斥其虚构的可能，因此《楚辞》中展现的屈原形象便属于“文学形象”。笔者便是基于这种文、史混淆的原因，所以欲深入探讨文人对屈原形象的接受。此外，为了了解屈原形象最初的情况，本文将屈原的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加以比较，以探讨后世对屈原形象的重构或解构。

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提出了古今楚辞学界在讨论屈原其人时都忽略的一大问题。汉、宋人以《屈传》为屈原之历史形象，并和司马迁一样，通过《楚辞》一再地补充屈原历史形象的空白。尽管时代变迁，近代学者提出过各种新论，或肯定或否定屈原，然而他们都没有察觉到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之间的灰色地带。本文提出此问题，并尽可能深入探讨，以发现处理屈原其人时的新视角。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二十世纪“屈原否定论”的提出以前，楚辞学界基本没有直接讨论屈原的论著，多数是诠释《楚辞》时一并提起。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作《屈原否定论系谱》，比较了几家“屈原否定论”的学说，细数出他们的可取和不足。总而言之，“屈原否定论”缘起于廖平和胡适，而系统化讨论的是后来的何天行和卫聚贤，以及日本学者铃木修次、三泽铃尔、岗村繁等人。否定论的批判者中，以郭沫若和黄中模的论著为代表，前者反驳了廖平和胡适，后者则反驳了何天行和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论点。这一场论辩将屈原和《楚辞》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无论是否定论或者是否定论批判者，他们都是以《楚辞》作为他们的论据。可以说，屈原的存在与否，“成也《楚辞》，败也《楚辞》”。除此之外，这场论战也展现了《屈传》对于屈原之存在的重要性。廖平与胡适之所以质疑屈原的存在，便是因为他们对《史记》之真伪与可靠性的质疑。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便一一为廖平和胡适所

质疑指出做反驳，论证《史记》之可靠。从这一场论辩中可以看出屈原、《楚辞》与《屈传》之间的“铁三角”关系。

将屈原形象区分成历史与文学两种并非本文首创。雷炳峰的〈《史记·屈原列传》与汉代屈原批评的两个维度〉中已经有提及，可是雷炳峰并没有明确区分屈原的历史形象²和文学形象³，也没有论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他有关于历史人物的历史与文学形象的论文，如席红霞的〈刘备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大异其貌之文化成因〉和王改萍的〈试析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描述为视角〉，雷炳峰之说与他们比较起来显然有许多模糊不清之处。事实上，模糊屈原之历史与文学形象的，并不只是雷炳峰，而是大部分且的古今文人。

汉与宋是古代楚辞学的两个高峰期。楚辞学在这两个时期兴盛的原因，历来有不少学者发表过意见。傅锡壬的《经典·屈原 楚辞》认为楚辞学在汉代为显学，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也有谈论到汉代社会政治与楚辞学兴起的关系。赵乖勋的博士论文《宋代楚辞学》探讨了宋人与屈原、《楚辞》的关系，也提出了宋人与汉人看待屈原的视角之差异。叶志衡的〈宋人对屈原的接受〉也论及了宋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与楚辞学兴盛于宋的关系。其他相关的论著还有许多，难以一一列明。拜读过这些论著以及汉、宋人的相关著作后，笔者认为汉、宋人所诠释的屈原形象除了受到客观环境影响外，不排除他们对屈原形象的诠释或有意而为之。

² 历史形象：正史中相对全面的历史人物形象。

³ 文学形象：一部文学作品服务而建构出的形象，这一形象可能符合历史形象，也有可能有所偏颇。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难题

本文主要运用的理论是接受美学。此理论重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诠释，并通过对这一方面的探讨展现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而本文欲探讨的正是后世对屈原与《楚辞》接受，以及他们对屈原形象的诠释。目前所知，司马迁是第一位为屈原作传的人，而《屈传》也成为了楚辞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以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可视为是屈原的“第一读者”，在他之前或之后都有人对屈原形象做过诠释，但他对屈原的形象建构却是较为广泛流传且影响后世的（陈文忠，1998：63）。因此，本文将分析司马迁于《屈传》中对屈原的诠释，以探讨此传被楚辞学界广泛讨论的原因。

除此之外，本文也将探讨司马迁以外的汉人以及宋人对屈原形象的接受与诠释。这一过程中也会运用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如期待视野、诗（Poetic）、愉悦（Aesthetic）、净化（Katharsis）等（金元浦，1998：12）。若要论及汉、宋人的期待视野，笔者需要对这两个时代的文人有所了解，比如他们的身世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因此，本文也会运用到社会—历史批评法来探讨他们诠释屈原的著作。

再者，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基本混为一谈，这一点以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情有可原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文学、历史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回旋往复的关系，认为“文学也是一种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a shaping power）”（盛宁，1995：28）。笔者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基础上，选择了司马迁的《屈传》为探讨对象之一，再通过新历史主义视角看待司马迁撰史，讨论影响他撰写《屈传》以及建构屈原历史形象的客观因素与主观意识。另外，以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说，《楚辞》对屈原其人的形象建构是有莫大影响的。后世将《楚辞》的部分作品归为屈原之作，而这些作品皆以第一人称书写，建构出了“屈原”的文学形象。因此，本文便将《史记》

中的屈原历史形象与《楚辞》中的屈原文学形象进行比较，以求方便梳理出后世屈原形象建构的脉络。

在探讨屈原历史与文学形象的过程中，笔者面对了一个古今学者都难以处理的问题。由于屈原之传记便是从《楚辞》这一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古今楚辞学大家都难以区分屈原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笔者所面对的也是切割屈原历史与文学形象的问题。除此之外，笔者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发现自身对汉与宋的历史不够了解，以致于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补充不足。

第四节 章节结构

本文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第二部分讨论屈原的忠君形象、第三部分则讨论屈原的爱国形象。

第一部分的研究对象为《楚辞》与《屈传》。多数学者会以《楚辞》的内容去印证《屈传》中的屈原历史形象，似乎这便能够建构出“真正的屈原”，然而笔者却认为这反而证明屈原历史形象的不稳定。文学允许虚构，历史相对真实。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两者是可以交流的，但也不否认过分的跨界确实带来弊端，即文学失去艺术美感或历史失去其真实意义。因此，笔者将比较《楚辞》与《屈传》中的屈原形象，探讨屈原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的异同。通过这一阶段的探讨，可梳理出后世屈原形象形成的渊源与基础。

第二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其余汉代文人。楚辞学于汉代可谓显学，汉代主流文学“赋”便是从楚辞演变成的。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探讨四位诠释过屈原且相对著名的汉人，即贾谊、扬雄、班固与王逸。此章节主要分析汉人所处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以展现汉人接受与诠释屈原时所带有的期待视野。此外，尊屈派和批屈派自

汉代便有，两派汉人对屈原“忠君”的形象是认可的，只是对屈原因“忠君”而做出的行为，他们或赞扬或批判。此章便是探讨两派汉人对屈原“忠君”形象的诠释。

第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宋代文人。宋代为楚辞学的第二个高峰期，更是楚辞学的转折期。汉、宋两代因学术思想及历史背景的差异，所以对屈原形象的接受与诠释有所不同。屈原的“爱国”形象始于南宋，这与南宋文人所面对的国家内忧外患有关。为了成立屈原“爱国”的正面形象，洪兴祖和朱熹下了不少功夫诠释屈原形象，此章将会对此做探讨。此外，本文也会分析几位宋代文人以屈原和《楚辞》为意象的文学作品，用以探讨宋人对屈原形象的接受。

第二章 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之建构

司马迁撰写的《屈传》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明确记载屈原其人其事的正史。虽然在司马迁之前，已有贾谊为屈原作《吊屈原赋》，而班固也指出《屈传》中部分文字出自刘安《离骚传》，但是贾谊与刘安的影响并不及《屈传》。其中的原因可推断为，《离骚传》已经亡佚，《吊屈原赋》则为文学作品，所以属于正史的《屈传》自然成为后世认识屈原最可靠的管道。是以，本文将司马迁为屈原历史形象的第一诠释者。司马迁是第一位为屈原作传者，定下了《卜居》《渔父》中的“屈原”就是《楚辞》中大部分作品的作者这一说法，以致于楚辞学研究很难不论及《屈传》。《史记》中有许多人物本纪和列传的史料来自于该人物的著作，《屈传》亦是如此。因此，本文假设《屈传》的编写是受到《楚辞》中所谓的屈原作品所影响。

《楚辞》是楚国文学作品集，里头建构出的屈原形象，无论是否出自屈原之笔，该形象都被视为“文学形象”。然而，这一文学形象却是司马迁建构屈原历史形象的参考对象，而且这种建构屈原形象的方式还不断地影响着后世屈原和《楚辞》的研究，令屈原和《楚辞》之关系紧密相连。本章比较司马迁于《屈传》中建构的屈原历史形象，以及屈原于作品中自叙的文学形象，以理清屈原形象的建构。

第一节 《屈原列传》的屈原历史形象建构

司马迁建构的屈原历史形象来自于《楚辞》中的屈原文学形象。然而，后世多以司马迁建构的屈原形象为本，直到清末民初以前并未有引人注目的质疑声浪。本节将比较屈原的历史形象与《楚辞》中的文学形象之共同之处，以探讨司马迁对屈原历史形象的建构。

在司马迁的叙述中，有不少矛盾以及前言不对后语之处。当然，这可以假设为司马迁史料来源广泛，并且即便该资料有疑点，司马迁也依然收录于文中，所以才造成这种矛盾的情况。总结前文提及《屈传》的材料，除了《楚辞》，司马迁也摘选了刘安《离骚传》的文字，另外还有与《楚世家》和《张仪列传》等文互证的文字。屈原的形象便是在这些资料的堆砌下建构出来的。根据《屈传》记载，屈原命运多舛、怀才不遇，但他在逆境中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愿随波逐流，甚至最后自沉汨罗以死明志。

《屈传》首先介绍屈原其人，指出屈原本名“屈平”，“原”为其字，这一点与《离骚》是不同的⁴。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对此作了解释，他引朱熹的说法⁵印证司马迁“屈原者，名平”（摘自司马迁，1982：2481）的说法。另外，司马迁于文中节录了《渔父》的文字，当中提到屈原官职“三闾大夫⁶”，与《屈传》前文“为楚怀王左徒⁷”（摘自司马迁，1982：2481）的说法有异。古今之人对三闾大夫和左徒的官职与职务都有注解，然而并无法印证何人之说法为之准确。此情形可视为司马迁对屈原之官职亦有犹疑，故而与文中并无对屈原任职三闾大夫做出反对，并将此资料录入《屈传》供后人参考。此举亦可视为司马迁对《楚辞》中的屈原文学形象之接受的证明。

司马迁的《屈传》里有不少赞美屈原之才能、行为与志气等的文字，而这些文字都可以与《楚辞》中那些被认为是屈原所作的作品进行互证。对屈原在官场上的才能，司马迁写道：“博闻强识……王甚任之”（摘自司马迁，1982：2481），

⁴ 《离骚》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3）

⁵ 朱熹的《楚辞集解》曰：“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君，调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摘自朱熹，2016：10）

⁶ 三闾大夫：王逸注，曰：“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

⁷ 左徒：张守节正义，曰：“左右拾遗之类”，而钱大昕曰：“楚之贵臣”。（摘自司马迁，2005：3834）

指出屈原之能力，对内可以治国，对外可以长袖善舞，游刃有余。《离骚》的作者自叙，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而《怀沙》也写道：“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彩”（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26）。这两句都是作者对自己能力的自我肯定与赞美。司马迁对屈原才能的描述，或是受《楚辞》中这些作品的影响。

对于屈原的为人与品格，司马迁也是高度标榜的，他评价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还说“其志洁”“其行廉”，还认为屈原的志向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摘自司马迁，1982：2482）的。《离骚》的作者频频以香草自喻，而“江蓠”“辟芷”“秋兰”等等的香草在《离骚》中都象征着高洁的品格，这与司马迁“其志洁”的评价是相符的。“其行廉”司马迁指的是屈原“死而不容”，不与世俗小人同流合污的态度，这与《离骚》中作者“九死未悔”的态度是一样的⁸。“与日月争光”一句也似乎是在与《涉江》的“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13）呼应，是司马迁对屈原志向的肯定。

此外，《屈传》中叙述屈原被小人陷害的经过，“怀王是屈原造为宪令……王怒而疏屈平”（摘自司马迁，1982：2481）。在《离骚》中仅提及作者遭人嫉妒，曰：“羌内恕己以諒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0）。与此内容最为相似的是《惜往日》⁹的文字，只是前者对屈原遭人陷害之事件始末写得较为详细，而后者则更多是作者叙述自己遭小人陷害的怨愤心情。司马迁还指出，屈原就是在这一事件后，“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⁸ 《离骚》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2-13）

⁹ 《惜往日》曰：“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昭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立法兮，属贞臣而日嫉。秘密事之载心兮，随过失犹弗治。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31-132）

（摘自司马迁，1982：2482）所以才创作《离骚》以抒发心中之哀怨。司马迁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描写，其文字不只与《惜往日》相似，在《离骚》中也有相似之处，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0）和“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3）等等。根据《屈传》的记载，屈原遭楚怀王疏远后，仍数次在政事上劝谏楚怀王，一次是劝杀张仪，一次是劝阻怀王入秦国。之后，屈原不得楚顷襄王的欢心，但他也不屈不挠地对国君表达忠心。这一点也符合《离骚》中作者以“余故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8）和“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6）等句所塑造的“博謇”形象。

在《屈传》中，言及屈原自沉殉志前，司马迁录入了《渔父》和《怀沙》。这一举动已是最能表现司马迁对《楚辞》中屈原形象的接受，甚至可以当做是司马迁对与屈原之人格已不能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述，而且认为直接用“屈原之作”来表现是更为贴切的。在史传与文本互证的情况下，《屈传》的可信度得到提升，以致于司马迁这位屈原的“第一读者”所诠释的屈原形象不断影响后世。

第二节 《楚辞》的屈原文学形象建构

《楚辞》中的作品以第一人称书写，因此充满个人意识，字里行间也就形成了叙述者的形象与内心世界。这一位叙述者并不等同于作者，然而，《屈传》以《楚辞》史料素材，古人多数也默认了《楚辞》中多数作品出自屈原，因此《楚辞》中的“余”“吾”“朕”等字就成了作者屈原的自称。尽管如此，他们又不是全盘接受《楚辞》中的屈原形象。例如，作者一开始就在《离骚》中自叙身世，指出自

己的身世，即“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2），但是这一条资料并没有被司马迁录入《屈传》中。

司马迁没有全然使用《楚辞》中与屈原相关的素材，或是因为《楚辞》中的作品多有作者“自我圣化”的元素。《九歌》是歌颂诸神的祭祀乐歌，其中神明的出现也常伴随着各种香草和美玉，如兰花、杜若、薜荔等香草以及琨、瑜等美玉。

《离骚》中的“屈原”以香草和美玉自比，并在身上佩戴香草和美玉。由此可见，在《离骚》这篇近似自传的文学作品中，“屈原”是不断地将自己神圣化，与世俗凡人区分开来。此外，根据胡学常的《屈原自我圣化的政治内涵及其悲剧性》，屈原不仅向往圣主明君，而且常于作品中将自身才学和品格比之尧舜等儒家圣人，颇有以圣人自许之态（胡学常，1997：66）。屈原作品的这一特色，或是司马迁为屈原作传时，引用《楚辞》内容有所取舍的原因。他们也应该意识到《楚辞》的内容有不实之处。在这一节，笔者要探讨的，正是那些没有被当做历史形象来接受，仅在《楚辞》中表现的屈原文学形象。

《楚辞》中被认为是屈原所作的作品，有不少内容提及“屈原”问卜的情节，如《离骚》中替“屈原”占卜的是“灵氛”和“巫咸”，《卜居》中的占卜者则是“郑詹尹”。通过这一问卜的过程以及“屈原”的措辞用字，我们可以看出“屈原”正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他犹豫着是应该与世俗同流，抑或是坚守自我。与此同时，“屈原”试图通过问卜求得占卜者的认同。占卜者是能与神沟通的通灵者，其中的“巫咸”更直接是神明的身份，“屈原”所问其实在他心中已有答案，问卜只是他想求得神明的认同。问卜的情节在《屈传》中只字未提，这或许与司马迁不赞同汉武帝迷信鬼神的观点相关。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便讽刺了汉武帝迷信鬼神之举；而他在《屈传》中对屈原赞扬有加，若提及屈原亦有求神问卜之举，恐让

人误以为他赞同迷信求神之举。由于屈原问卜并未有在《屈传》中出现，是以屈原的历史形象是坚守自我以及品格高尚，而没有表现出他对自己所坚守之事物感到犹豫，而且苦苦寻求认同的一面。

《楚辞》中除了“屈原”问卜的情节，还有“屈原”神游天界与诸神交流的情节。问卜一事已不被记载，“神游”这类基本可视为虚构的情节更不能收入正史之中。这便是屈原的文学形象，占卜者是通灵者，《楚辞》中的“屈原”亦然。

《离骚》提到了日神羲和、月神望舒、风神飞廉、雷师、云霓等神明，还提到“屈原”能驾龙凤飞天，与神交流。“屈原”的文学形象是与世俗凡人有一定距离，而且还趋向于神圣的。在《屈传》中，司马迁并不排斥屈原品格高洁以及志向与日月同光的形象，但是却没有效仿屈原用“飞升”来诠释神圣高洁的形象。

屈原的文学形象是神圣的，这形象在《离骚》开篇就订立了基调。他自称出生于吉时，即“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2），所以父亲赐了他好名字，即名“正则”，字“灵均”。首先，《屈传》中不仅没有提及屈原出生的时辰，这可视为司马迁对《离骚》中屈原自称的生辰抱持不信任的态度。再者，《屈传》也没有明确屈原自沉于何时，也就是说，屈原的生卒年是不可考的。可是，在司马迁之后，那些《楚辞》的注解者以及近代学者皆以此为线索来推算屈原的生卒年。接着，《屈传》并没有处理屈原于《离骚》中自称名“正则”，字“灵均”一事。“平”“原”与“正则”“灵均”之间的关系，是宋人朱熹注解《离骚》时才将它们联系起来，朱熹于《楚辞集注》中指出“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君，调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则、灵均，各释其义，以为美称耳”（摘自朱熹，2016：10）。朱熹的注解无疑合理化了《离骚》与《屈传》所述之人名字不同的现象，而且这一注解也提到了“正则”“灵均”为“美称”，可见《离骚》中对主人公的美化之用心。

司马迁对“屈原”的神圣形象是选择性接受的。他收录《渔父》于《屈传》之举，其实可以看出他其实是认可屈原与众不同的高洁品格的。《渔父》中“屈原”与“渔父”的对话，表现的就是一正一反的对比，前者是出世的，坚守自身原则的，而后者是入世的，随波逐流。文中“屈原”道出的“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和“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58-159）等句也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以呈现屈原与众不同的高洁形象。

第三章 汉人对屈原“忠君”形象的衍生

比对过《楚辞》与《屈传》中的屈原形象后，本文可以确定屈原之历史与文学形象是有重叠之处的。此外，本文也发现司马迁并没有完全采用的屈原文学形象，但这并不妨碍屈原文学形象的流传。在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以前，刘安和贾谊等西汉文人已开始与楚辞学相关的活动，如“汉赋”便是由楚辞体演变而来。傅锡壬（2012）指出，楚辞学的盛行是因为汉代统治阶级的推崇，使楚辞学成了汉代的显学（傅锡壬编著，2012：63）。由此可见，《楚辞》在汉代是广为流传的，汉人对屈原的文学形象也是深刻的了解的。

汉人作为屈原形象的第一接受者，他们对屈原形象的诠释是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屈传》中指屈原“正道直行，歇忠尽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摘自司马迁，1982：2428），这两句确立了屈原“忠君”的形象。汉人对屈原的“忠君”基本是接受的，只是他们对屈原“忠君”的所作所为却是褒贬不一。汉人对屈原的诠释，可以分为“尊屈”和“批屈”两派，而多数批屈派都是“褒中带贬”的，如贾谊和扬雄便是如此。

汉人对屈原的诠释之所以分成两派，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文化思想有关。本文此章节便是要梳理出汉人对屈原的接受与诠释，探讨汉人对屈原“忠君”形象的衍生说法，以了解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在汉代的发展。

第一节 汉人对屈原“忠君”形象的矛盾态度

汉代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为楚人，这一层关系使汉代统治者对《楚辞》有着别样情感。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出汉代的文化与楚国相似，《史记·孝武帝本纪》和《史记·封禅书》都记载了汉武帝迷信鬼神，将楚地最高神明“东皇太一”奉为汉

代最高神明之事（司马迁，1982：456）。文学上，汉高祖的《大风歌》和汉武帝的《秋风歌》也是具有楚地歌谣特色的作品。除此之外，《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提及，楚地一直流传着楚南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摘自司马迁，1982：300）的谶言。秦汉之际，反秦起义军中的几位领袖如刘邦、项羽、陈涉、韩信、萧何、范增等皆为楚人，间接应验了楚南公的预言。汉人身处于这种历史与文化的环境，楚辞学作为楚文化而被重视情有可原。

除此之外，由于楚汉之争刚刚结束，高祖听从相国萧何的建议以黄老学说治国。《史记·曹相国世家》亦有记载，惠帝时继任相国的曹参是延续萧何黄老之治的（司马迁著，2004：3063）。黄老学说在汉初可说是由上而下影响着汉人的思维，然而此道后来却引起了政治与社会问题，因此到了汉武帝之时汉人便经历了一场思想的改革，从道家主流转为儒家主流。汉代是一个从百家争鸣转向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时期，也是从封建政治转入中央集权政治的时期。这种思想与文化的过渡，影响了汉人待物的视野。汉人发表过不少与屈原相关的言论，而这些言论都受到当时的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影响。

《汉书》记载，汉初孝文帝时期，贾谊已经提出改革建议¹⁰。由于其建议危及朝中老臣的利益，因而遭谗言所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班固，2002：2222）。贾谊作《吊屈原赋》，开篇写道“埃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摘自贾谊著，1996：410），明确指出其写作目的。尔后，贾谊写道“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摘自贾谊著，1996：410），指出屈原生不逢时，并且仿佛身临其境

¹⁰ 《汉书·贾谊传》：“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摘自班固撰，2002：2492）

般描绘出屈原身处于一个何等恶劣的环境。贾谊有此描述是因为他自身遭遇与屈原相似，他借屈原以喻己，他为屈原惋惜实则是对自身遭遇的不忿。

此外，在《吊屈原赋》中，“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摘自贾谊著，1996：412）这段话借了《离骚》的乱辞：“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1），可是两者却表达了不同的意义。《离骚》的乱辞，最后是随“彭咸”而去，即与彭咸一样选择自沉；贾谊的这段话却表现了他对屈原以死明志的不认同。《吊屈原赋》中的“固自引而远去”“沕深潜以自珍”和“远浊世而自藏”（摘自贾谊著，1996：412）明确表达了贾谊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因此“何必怀此都也”在贾谊的文中表达的是屈原应该另择明主，而非自沉。贾谊的观点与汉初的思想风气有关。汉初文人带有战国时期“良禽择木”的士人之风，汉初主流的黄老思想亦倡导远离祸端，即便是贾谊推崇的儒家思想亦有“穷则独善其身”（史次耘注译，1984：342）的处世态度。在这种风气之下，尽管贾谊对屈原的遭遇有共鸣，却依旧无法理解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2）的心情。总而言之，贾谊对屈原的看法是矛盾的，即为一位贤能忠臣身陨而惋惜，却又不认同这位忠臣“自湛汨罗”的举动。

除了贾谊，另一位对屈原亦褒亦贬的汉人，便是身处西汉末年的扬雄。西汉中期，汉武帝施行政治改革，推崇儒家思想，立五经博士，汉人也因此逐渐从崇尚黄老学说转向推崇儒家学说。然而，黄老思想依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人的思维，因而汉人的思想出现了“儒道相融”的情况。边家珍（2002）整理了扬雄论著中的思想，指出扬雄早期虽崇尚道家，但在其著作《法言》中却可见其推崇孔子之说。

扬雄以孔子传人自居，贯通各家学说并融入儒家，使儒家学说更为丰满（边家珍，2002：60）。扬雄对屈原的接受与诠释便展现了这种杂糅的思想背景。

扬雄的《自序传》中提到《反离骚》的创作动机，他写道：

“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摘自张溥，1979：353）

文中“何必湛身哉”（摘自张溥，1979：353）一句已然表明扬雄不认同屈原自沉之举。然而，扬雄又写“怪屈原文过相如……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摘自张溥，1979：353），这段文字明显表达了扬雄实则对屈原文字感同身受。扬雄的情况与贾谊对屈原的接受是相似的，即赞叹屈原之文采，也同情屈原，却又不认可其自沉之举。

西汉末年，中央集权制已然完备，社会与政治走向了“君权至上”。在这种价值观驱使下，扬雄认为臣子应安分守己，审时度势以保全自己方为君臣相处之道（王凯波，2014：85）。这显然是儒家“君君臣臣”以及道家“全身远害”思想的融合。扬雄的处世之道使他对屈原自沉不解，因而在《反离骚》中不断地反问屈原，道：

“横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苍吾。驰江潭之汎溢兮，将折衷摩重华……

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夫天年。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於西山……违灵氛

而不从兮，反湛身於江皋。”（摘自扬雄著，1993：165-168）

扬雄在这段文字中质问屈原的言行不一，“言”即是指屈原在《离骚》提出的种种向往，“行”即是其“湛身”汨罗。他指出，屈原在《离骚》中表达了对苍梧与重华的向往，又曾经占卜问事，可是到最后屈原依然选择自沉江底。《反离骚》最后

以孔子为例，道：“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於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摘自扬雄著，1993：165-168）。扬雄于此表达的是屈原并非走投无路的，只是屈原不愿意走罢了。《反离骚》处处与屈原的《离骚》作对，最后却以孔子作为屈原可以效仿的对象，可见扬雄对屈原之才能的认可，以及对屈原怀才不遇的惋惜。

综上所述，贾谊与扬雄对屈原的接受与诠释是褒贬参半的。他们所认识的屈原显然是“忠君”的，也认可屈原的才能。只是，他们并不苟同屈原为了维护志向与品格而自沉，这一观点自然与汉代的政治思想有关。此外，贾谊与扬雄在作品中多引《离骚》之文字，扬雄之作甚至命名“反离骚”，两人此举已然展现汉人对屈原文学形象的接受。若是贾谊尚可说是《屈传》仍未出世而情有可原，扬雄则显然是在《屈传》出世后，仍将历史与文学形象混为一谈的表现。

第二节 汉代尊屈派与批屈派的“忠君观”

根据《汉代思想史》的叙述，汉初“清静无为”的治国政策在后来引发了不少弊端，贾谊为此提出了“礼治”政策。尽管当时不被汉文帝采纳，但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却顺利地继续了这一系列改革。董仲舒确立三纲五常和严格的阶级制度，更将忠与孝联系在一起，并推为至尊至圣的品德（金春峰，1987：191-194）。这一系列的思想工作，无疑改变了汉人的处世态度。

再者，中央集权制在汉代一步步稳固，君主的权威也随之渐渐走向一个“君权至上”的极端，从贾谊和扬雄“劝说”屈原的所言便可看到这一变化。身处汉初的贾谊认为屈原应该离开楚国，另寻明主；而身处西汉末年的扬雄则将屈原的遭遇视为“命”，以宿命之说劝解屈原认命并审时度势。前者展现的是身为人臣若要忠

心，则忠心于明主；后者则是因为君主专制后，臣子身不由己的状态下，生发出来的处世态度。

无论如何，屈原忠君的形象深入人心，只是汉代文人因为思想变化而对屈原之“忠君”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这一点通过东汉时期的班固和王逸之论说便可窥探一二。班固与王逸分别为批屈派和尊屈派代表人物，他们对屈原形象的诠释明显渗入了儒家思想中，然而他们对屈原最后选择自戕却持有一贬一褒的观点。

班固曾作《离骚赞序》和《离骚解序》，但是班固在这两篇文章中却表现了两种不同且矛盾的态度。《离骚赞序》曰：“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转引自汪瑗撰，1996：10）又曰：“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转引自汪瑗撰，1996：10）显然《离骚赞序》中，班固是认同并推崇屈原是忠君且品格高洁之人。然而，于《离骚解序》中，班固却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依然赞许屈原之文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转引自汪瑗撰，1996：9），但对屈原之为人却批评道：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馋贼。……愤懑不容，

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

光，过矣。”（转引自汪瑗撰，1996：9）

这段文字已明确了班固“露才扬己”和“沉江而死”的批判。对班固而言，屈原的行为过于偏激，而且不符合儒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¹¹（转引自汪瑗撰，1996：9）的诗教。因此，班固认为前人（刘安与司马迁）指屈原之志可“与日月争光”属言过其实。

¹¹ 班固引自《诗经·大雅·烝民》。

班固于《离骚解序》中并没有否认屈原所作所为出于“忠君”之心，他只是不满于屈原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班固的观点与他身处的时代有关。王凯波（2014）指出，班固所处的时代对于“忠君”的理解已经走向绝对，君权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离骚解序》指出屈原为官时“竞乎危国群小之间”，又“责数怀王，怨恶椒兰”（转引自汪瑗撰，1996：9）这些在班固看来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在他身处的时代，君臣之间另有一番相处之道，臣子的职责主要在于维护君权（王凯波，2014：86）。

王逸属于尊屈派代表人物，与班固之立场对立。他于《楚辞章句》序《离骚》指屈原此作“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2），显然认为屈原是一位君子都“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的人物。王逸处于时局动荡的东汉中期，班固的君臣之道已不合时宜，反而是屈原“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的“人臣之义”（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2）更受推崇。在王逸看来，国家局面不稳定，文人应该效仿屈原“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2），勇于担负责任，而非全身避祸。王逸于《离骚后叙》为自己的论点提出了论据，指出屈原作《离骚》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2），就如同孔子“定经术，删诗书”（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1）。王逸将《离骚》与儒家《五经》作比较，将屈原这位《离骚》的作者建构成了“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的“名儒博达之士”（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3）。

王逸于《离骚序》简介了屈原的生平，文中多沿用刘安与司马迁之说。此举可见其对屈原历史形象之接受。尔后，王逸对《离骚》的注解又多处提及屈原之身世，展现了王逸将屈原在《离骚》中的文学形象等同于历史形象的现象。《离骚后叙》以孔子、诗教与《五经》肯定《离骚》之价值，继而对班固的批判进行反驳，

将屈原的形象提升为儒家圣贤君子。王逸无疑是将屈原的文学形象视作历史形象的，他模糊了两者的界限，并为屈原的形象增添了几笔儒家色彩。

综上所述，在汉代统治者的推动下，楚辞学兴盛于汉；而汉武帝之后，儒家大兴，中央集权制越趋成熟稳固。汉人一方面推崇屈原之文采与品格，一方面又受儒家思想左右，这使他们对屈原的诠释出现了矛盾。除此之外，汉代局势变迁，客观环境亦影响了汉人对屈原的诠释，令屈原形象变得多样。在汉代，屈原时而是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时而是以身殉志的烈士，时而是行为张扬的朝臣，时而又成了伏节死义的君子。这种种的形象并没有哪一种成为主流，直到宋人对屈原形象的“重塑”。

第四章 宋人对屈原“爱国”形象的重塑

宋代是汉代以后对楚辞学的另一个高峰时期。从汉代至宋代这一千多年间，楚辞学界未有新论，文人对屈原形象的诠释皆与汉代相差无几，在褒贬之间摇摆不定。直到宋代，尤其南宋以后，先是洪兴祖著《楚辞补注》，再是朱熹著《楚辞集注》，这两部注释本是宋代屈原形象重塑的关键，更是后世楚辞学界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北宋中期，文人之间分别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首，分成了保守派和改革派，为制度革新之事闹得不可开交，不少文人因此遭遇贬谪，仕途坎坷。《宋史》记载，钦宗靖康年间，金人入侵，开封沦陷，徽、钦二宗被掳，康王（宋高宗）即位于南京，偏安一隅（脱脱等撰，2004：436）。经历这场“靖康之变”，文人便分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前者主张北伐，打着“还我两宫，复我疆土”的口号；后者则主张与外族议和，维持现状。北宋与南宋的党派之争，致使一批文人怀才不遇，南宋文人更因为“国耻”而激起了“爱国”思想。

由于国家的内忧外患，宋人在屈原身上找到了共鸣。北宋时期，怀才不遇的文人借屈原以抒情，这与贾谊作《吊屈原赋》的情况相似。南宋时期，文人除了怀才不遇，更多是报国的志向与热血无处抒发。屈原的自沉在他们眼中是以身殉国，与国家共存亡。这形象无形中鼓励着这批报国无门的文人。

本文在这一章节将探讨屈原“爱国”形象的形成。本文将先通过宋代文学作品来探析屈原对宋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接着，本文将通过洪兴祖与朱熹的论著，探讨屈原“爱国”形象的建构。

第一节 屈原作为宋代文学中的“爱国”意象

汉人可谓为屈原形象的第一接受者，宋人对屈原形象的接受继承自汉人在所难免。赵乖勋的《宋代楚辞学》论文中提出，汉人与宋人看待屈原时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前者看的是个人遭遇，后者则是关注国家利益（赵乖勋，2011：129）。这一点并不完全贴切，北宋文人其实更趋向汉代尊屈派的主张，只是朝堂上的遭遇使他们逐渐对屈原形象有了新的诠释，才有了站在国家利益视角看待屈原的南宋文人。

北宋大家苏轼曾作《屈原庙赋》和《屈原塔》。在《屈原庙赋》中，苏轼表现了对屈原之死的悲伤，但是他并不像贾谊和扬雄那样亦褒亦贬，而是直接表达出对屈原“违国去俗死而不顾”（摘自苏轼撰，2004：2）的推崇。文中苏轼明确表达自己对批屈派言论的不忿，更指责扬雄会有“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的论点是因为扬雄并不理解屈原之“高节”（摘自苏轼撰，2004：2）。此外，苏轼认为“君子之道”和“全身远害”（摘自苏轼撰，2004：2）并非必然，更指出屈原虽然偏离中庸，却不失为一名贤者。

苏轼的《屈原塔》同样是悲屈原之死。《屈原塔》开头“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摘自苏轼撰，1999：22），是指楚国父老为屈原之死悲伤了千年仍未能停止；结尾处则是为屈原“持死节”是因为理解“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摘自苏轼撰，1999：22）的道理。《屈原庙赋》篇幅较长，苏轼亦未能融入理论，《屈原塔》作为字数更少的诗，苏轼更难以寥寥数字为屈原辩驳。然而，苏轼这两部作品已可见其对汉代尊屈派论说的继承。在这两部作品中，苏轼接受的屈原形象，更多是实现了自我价值的。

靖康之变后，宋人背负起捍卫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由于主和派当权，主战派接连遭遇贬谪，报国无门。但他们并不愿卸下责任，而是借文学以抒发激情与愤慨。

这批文人发现了屈原与他们的共同之处，不仅不认为屈原的种种行为有违儒家中庸之道，还标榜屈原为爱国烈士。因此，屈原和《楚辞》等此俨然成了宋代文学作品中表达爱国之情的意象。

陆游为南宋主战派大将，与主和派发生冲突而遭弹劾罢官。南宋主战派始终式微，陆游空有满腔抱负，唯抒以诗词。在陆游的诗词中，我们也能找到屈原的“身影”。在《哀郢二首·其一》这首怀古诗中，陆游先写楚国曾经“北盟齐晋势争强”，以楚国强盛之景对比其衰亡后“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转引自严修著，1996：82）的苍凉。陆游以楚国之兴盛与衰亡的对比来表达“灵均恨”。所谓“灵均恨”即是屈原爱国却无力挽回楚国灭亡的局面之愤恨与悲痛。诗末“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转引自严修著，1996：82）则表达了作者对“灵均恨”之共鸣，反映了作者将自身爱国之情寄托于屈原身上，并借着咏史怀古诗抒发出来。

此外，陆游在《屈平庙》中写道“恨公无寿如金石，不见秦婴系颈时”（转引自严修著，1996：148），此段不仅是惋惜屈原没能看见灭楚的秦政灭亡，更是感慨南宋收复中原遥遥无期。在《白鹤馆夜坐》中的“屈宋死千载，谁能起九原”，同样是陆游借屈原以抒发对南宋无能人抗敌的悲愤。除了这几首诗，陆游也在《沙市阻风》和《楚城》等诗作中表达对屈原其人的怀念。在陆游的几首诗作中，不难看出其对复国的渴望。可惜现实并不如意，因此他只能借着咏怀古人抒发志向，而屈原便是他依托的对象。

辛弃疾亦是主战派文人。他中年时遭弹劾罢官，长达二十年闲居在乡。辛弃疾亦未曾放弃复国志向，他在《水调歌头·赋松菊堂》¹²《满江红·山居即事》¹³和《踏莎行·赋木樨》¹⁴三阙词中描绘了一幅闲暇读《离骚》的情景，实则展现了闲居的他，其实和被流放的屈原那样无时无刻、心心念念的都是国家。此外，《喜迁莺·谢赵晋臣敷文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谢》这阙词也表现了辛弃疾对屈原的赞美。这阙词为咏荷花之词作，词的下阙则将屈原与荷花相提并论，“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摘自辛弃疾著，2007：71）两句指出屈原世人皆知的“内美”与“修能”（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之形象。

从北宋至南宋，屈原在宋人眼中的形象以及意义起了微妙的变化。“忠君爱国”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更成为了诗词中的典故。自汉代以来，屈原一直是怀才不遇的文人士子依托的对象。贾谊和扬雄虽然对屈原的自戕并不赞同，却也不免借屈原来浇自己块垒。宋人除了借屈原抒发怀才不遇的哀怨之外，更借屈原于文学作品中发泄压抑于心中的报国热血。

第二节 宋儒对屈原“爱国之诚”的诠释

在《关于屈原“爱国主义”问题的重新探讨——屈原“爱国主义”世人质疑》文中，刘毓庆指出，由于郭沫若和游国恩等人的倡导，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的形象基本已被学术界所认可（刘毓庆，1988：62）。屈原的“爱国”形象实为南宋之时，尊屈派文人洪兴祖和朱熹所确立。他们将儒家思想融入屈原的形象，并针对

¹² 《水调歌头·赋松菊堂》：“手把《离骚》读遍，自扫落英餐罢，杖屦晓霜浓。”（摘自辛弃疾著，2007：41）

¹³ 《满江红·山居即事》：“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摘自辛弃疾著，2007：56）

¹⁴ 《踏莎行·赋木樨》：“未堪收拾付熏炉，窗前且把《离骚》读。”（摘自辛弃疾著，2007：106）

批屈派的论点一一进行反驳与批判。通过探讨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位爱国文人诗词，显然屈原之“爱国”形象塑造得很成功，而且显然尊屈派在后来已成为主流。

南宋是一个看似安宁实则腹背受敌，国家局势很不稳定的时期。宋人对外有外族虎视眈眈，内部又有激烈的党派之争。此情此景与屈原身处的环境极为相似，激发了宋人与屈原之间的共鸣，也是洪兴祖与朱熹投身楚辞学的原因。洪兴祖注解王逸的《离骚后续》，曰屈原有“爱君之诚”（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4），而朱熹的自序中则指屈原是“忠君、爱国之诚心”（摘自朱熹撰，2016：4），两人论说中的“诚”字正是南宋文人对屈原形象重塑的一大特征。

洪兴祖对屈原的接受来自于王逸，其《楚辞补注》是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汉代，无论尊屈派或批屈派，汉人对屈原的理解一直都建立在个人价值的实现上，如尊屈派赞扬屈原个人之品德，而批屈派指责屈原未有考虑身处朝堂的利弊得失，损害自身利益。王逸之说是批屈派的反驳，但是却没有跳脱出批屈派的框架，有被批屈派牵着走的意味。批屈派指屈原行为偏激，王逸便说屈原这番“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方为“人臣之义”（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2）。王逸的说法反驳了批屈派对屈原的指责，并认可屈原已尽到其身为臣子应尽的责任。

洪兴祖在王逸论说基础上的突破，是其指出屈原忠君源于自身“与楚同姓”（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4）的缘故。根据洪兴祖的诠释，屈原在楚国不被重用却依旧不愿意离开另寻明主，是因为楚国和楚王对他而言不仅是一个邦国或一个国君。屈原“与楚同姓”（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4），楚国是他的“家”，楚国上下都是他的“家人”。若他选择离去，便是背离家族，在情在理屈原都不可能离开另侍他主。职是之故，屈原只能留在楚国，并在楚国国势踏入无可挽回的地步时，选择自沉，与楚国共存亡，“尽其爱君之诚耳”（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4）。

洪兴祖之说不禁认同王逸所谓的屈原尽了“臣子之义”（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4），而且提出屈原不得不选择自戕的理由，建构出一名将国家利益看得比自己得失更重要的形象，使屈原与国家共存亡的忠臣形象更为合理。

事实上，洪兴祖所指的“爱君之诚”来自于屈原“与楚同姓”（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4），这里头已隐约透露出“爱国”的意味。可是真正且明确指出屈原爱国的，还要等到朱熹的《楚辞集注》。此外，在朱熹的解读下，屈原不只是忠于楚王，而是发自内心的爱着楚国和楚国人民，达到“缱绻恻怛，不能自己”的地步，而且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心”（摘自朱熹撰，2016：4）已然超越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与担忧。显然，朱熹的诠释比之洪兴祖手段更高明一些。洪兴祖笔下的屈原，其所作所为皆出于“与楚同姓”这一原因所驱动，而朱熹则直接将屈原解释成一位对国家之兴亡怀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感的文人。

朱熹在自序中为屈原志行“过于中庸”以及辞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且“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辩驳（摘自朱熹撰，2016：4）。朱熹指出屈原这番方为合乎“天性民彝之善”（摘自朱熹撰，2016：4），是因为屈原身处的环境和所遭遇的不幸，所以才会有这番作为。言下之意，屈原那些被批屈派诟病的行为其实并非其为人张扬或是不明智，而是现实与其志向相悖，时势所迫之下才会有这些行为。在针对扬雄的《反离骚》所写的后序中，朱熹对屈原“过于中庸”（摘自朱熹撰，2016：4）的行为追根究底，指出“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摘自朱熹撰，2016：218），并以孔子“观过，斯知仁矣”（摘自毛子永注译，1984：47）这一论点包容屈原之“过”，直接点出屈原是合乎儒家之“仁”的。

朱熹的《楚辞集注》继承了尊屈派对批屈派论点的反驳，并且加入宋代理学的理论作为论据，将司马迁、王逸和洪兴祖等人的论点加以完善，建构并巩固了屈

原忠君爱国的形象。此外，朱熹之论说也使屈原为国家“虽九死其犹未悔”（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2）的形象不再是偏激之举，而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摘自司马迁，1982：2482）的崇高志向。

在尊屈派文人的努力下，再加上失意文人与屈原之间的共鸣与共情，屈原之形象在宋代渐渐转变。在南宋民族矛盾的刺激下，文人激起了爱国情绪和对民族责任，他们在屈原身上找到共同点，甚至是共鸣点，促使屈原成为了报国无门的文人心中的寄托。苏轼、陆游和辛弃疾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屈原为“爱国”的意象。由于这是在文学作品中的诠释，我们并不能苛刻限制他们对屈原形象的衍生。然而，洪兴祖与朱熹是在《楚辞》的注解中诠释屈原的形象，在他们而言，屈原等同于《楚辞》中诸多作品的作者，他们书写的便是作者之生平事迹。因此，将他们笔下的屈原形象视为历史形象属理所应当。洪兴祖与朱熹的诠释虽然在儒家思想上走出了汉人走不出的束缚，但是在屈原形象的接受与诠释上，却还是停留在司马迁撰写《屈原传》的那一步。

第五章 结 论

为了了解屈原形象，本文将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做了比较。事实上，将历史人物的形象分成历史与文学两种并不罕见。中国有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都因为文学作品的再创造，因而产生了与历史形象有差异的文学形象。可是，屈原的情况却与其他历史人物有一关键性差别：一般历史人物是先有史书的历史形象为原型，再由作者以作品之需求而衍生或改造，例如《三国演义》的原型是《三国志》，前者是元末明初之作，而后者是晋代史书；此外，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其故事原型为武王伐纣，同样也是历史事实，人物多数是史书上有迹可循之人。相较之下，屈原的则反过来。

《楚辞》中明确提到“屈原”的是《卜居》和《渔父》，然而这两篇的叙述角度明显与其他“屈原作品”不同，它们是以第三人称书写，而且体裁更近似汉代的赋。司马迁撰写《屈传》前，除了这两篇作品便再没有提及屈原这人的文献了，而《卜居》和《渔父》显然是文学作品而非历史文献。由此可见，屈原最原始的形象显然是《楚辞》中的文学形象。除了《卜居》和《渔父》，其余作品如《离骚》《天问》《九章》等，因为被认为是屈原之作，而且这些作品又以第一人称书写，因此后世多以它们为屈原形象之参考。这一点无论是批屈派或是尊屈派都不可避免。

司马迁对屈原的形象接受来自于其在《楚辞》的文学形象，经过精挑细选后再配合楚国史实，继而建构出《屈传》中的历史形象。故，《屈传》表现的历史形象基本与《楚辞》的屈原文学形象重叠。司马迁是第一位诠释屈原历史形象之人，他建立屈原历史形象时的方法无疑影响了后世如何看待屈原之历史形象。新历史主义批判说历史也可以像文学那般具有想象与虚构。司马迁之《屈传》无疑是对屈原不完整的历史形象进行文学的想象后建立的，而他想象的参照物则是《楚辞》。

《屈传》中的屈原历史形象是从《楚辞》中的文学形象筛选出来的，这一点表现了屈原文学形象实则更多元。后世文人因为受《屈传》的影响，模糊了历史与文学形象之间的界限，因此他们对屈原形象的接受是同时来自于《楚辞》和《屈传》。《楚辞》中没有被选入《屈传》作为历史形象的部分，便成为文人衍生、发展甚至重塑屈原历史形象的空间。这种情况导致本就纵横交错的屈原历史与文学形象更加混淆不清。

《楚辞》中含有屈原文学形象的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叙事抒情，并运用比兴手法建构出的自我如香草又如美玉的崇高形象，其中美化成分显而易见。然而，尊屈派和批屈派文人都将之直接视为作者的自我表现。属于尊屈派的司马迁虽未在《屈传》中提及屈原在作品中自我赞美一事，但是文中对屈原的赞美多与《楚辞》中的文字相似，从这一点看来，司马迁似乎并不排斥这“自卖自夸”之举。批屈派班固却对此做出明确的批判，甚至对《屈传》指屈原之志向“可与日月争光”这一评价言过其实。南宋的洪兴祖和朱熹序《离骚》都是沿用刘安与司马迁的话语，并且他们都反对屈原“露才扬己”。他们除了将屈原自我赞美之举合理化，也将屈原推为“爱国诗人”，使《楚辞》中的文辞不再是美化，而是屈原真是“人如其文”。

除此之外，《楚辞》建构的屈原文学形象是能遨游天界的通灵者，此举虽然可能只是一种文学笔法，却也使屈原形象“圣化”了。《屈传》对此并不作记载，而后世尊屈派文人中，朱熹也指这是屈原情不自禁的文学笔法；批屈派则认为屈原写下“虚无之语”，因而批判其“非法度指正”。无论如何，两派文人不信屈原能够通灵，但还是会因此而影响他们对屈原的看法。有趣的是，近代楚辞学研究中，有学者却以《楚辞》中的占卜以及神游天界情节为线索，认为屈原在楚国之职为灵巫。根据高扬的《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日本屈原否定论者白川静否定

了屈原之存在以及其对《楚辞》的著作权，并依照《楚辞》内容推断《楚辞》作者为楚国巫祝团体。白川静的推断并没有确切证明，因此后来也遭到黄中模的反驳，而黄中模之反驳依据亦是回到《楚辞》，以《楚辞》论证屈原为真正的作者（高扬，1998：45-48）。从白川静与黄中模的论辩中，明显看出屈原其人存在与否、屈原与《楚辞》的关系、屈原之形象等等问题，都是人们从《楚辞》内容而衍生出来的假设与推论。

文学是允许虚构与想象的，而历史是已经发生且不能改变的事实。屈原的历史形象不完整，其文学形象却是浓墨重彩。汉、宋人对《楚辞》中的“屈原”有共鸣，因而有意无意间便对照着此形象勾勒出历史上的“屈原”。汉、宋人并没有想到《楚辞》里头一直自吹自擂的可能是虚构的人物，或者是夸张化的形象。即便是指责过屈原“露才扬己”的批屈派，也只是意识到屈原之张扬，却没想到过这可能是虚构出来的“张扬”。郭沫若等几位大家延续了汉、宋人所诠释的“忠君爱国”的屈原形象，将屈原定位成“爱国主义诗人”，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论著更毫不吝啬地将“伟大”这个褒义词用在屈原身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经历过各式各样文人的衍生与重塑，两者之间已经看不到界线。如此情况存在千年之久，一般人难以察觉其中问题所在，可即便是古今楚辞界翘楚也不以为意。强行去切割其实也没有意义，因为无论是属于历史形象或是文学形象，如今为人所知的“屈原”已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一环。唯其不可否认，屈原确实是古今文人一步一步勾勒出来的“箭垛式人物”。

参考文献

一、书籍

班固撰（2002），《汉书》（全十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陈文忠（1998），《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

傅锡壬编著（2012），《经典。屈原 楚辞》，台北市：麦田出版。

洪兴祖补注（2007），《楚辞补注》（卞岐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

胡适（2013），《胡适文存二集》，北京：外文出版社。

贾谊著（1996），《贾谊集校注》（王洲明、徐超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金春峰（1987），《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元浦著（1998），《接受反应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毛子永注译（1984），《论语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

盛宁（1995），《新历史主义》，台北市：杨智文化。

史次耘注译（1984），《孟子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

司马迁（1982），《史记》（全十册），北京：中华书局。

司马迁著（2009），《史记会注考证》（泷川龟太郎考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苏轼撰（2004），《苏轼文集》（茅维编、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苏轼撰（1999），《苏轼诗集》（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脱脱等撰（2004），《宋史》（全四十册），北京：中华书局。

汪瑗撰（1996），《楚辞集解》（董洪利点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辛弃疾著（2007），《新校编辛弃疾全集》（徐汉明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严修著（1996），《陆游诗集导读》，四川：巴蜀书社。

扬雄（1993），《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扬雄集校注》（张震译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易重廉（1991），《中国楚辞学史》，湖南：湖南出版社。

张溥（1979），《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台北：文津出版社。

朱熹撰（2016），《楚辞集注》（黄灵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专书论文

刘毓庆（1988），〈关于屈原“爱国主义”问题的重新探讨——屈原“爱国主义”诗人质疑〉，中国屈原学会编，《楚辞研究》（页 62-77），济南：齐鲁书社。

三、学位论文

赵乖勋（2011），《宋代楚辞学》，未出版博士论文，四川：四川师范大学。

四、期刊论文

边家珍（2002），〈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页 58-62。

稻畑耕一郎著（1977/1983），〈屈原否定论系谱〉（韩基国译），《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页 19-30。

高扬（1998），〈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天中学刊》，第13卷第1期，页 42-49。

胡学常（1997），〈屈原自我圣化的政治内涵及其悲剧性〉，《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页 65-71。

雷炳峰（2014），〈《史记·屈原列传》与汉代屈原批评的两个维度〉，《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6期，页 19-23。

王凯波（2014），〈屈原评论中汉代士人忠君观念的演变〉，《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3期，页85-87。

王水照（2003），〈《屈原与宋代爱国文学》序〉，《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页59-60。